

“文以载道”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契合

江守义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和 20 世纪 20 年代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诸多契合之处: 它们都通往理想, 含有对太平盛世的期望, 并将文学和现实联系起来, 使文学在产生教化功用的同时超越工具论。传统“文以载道”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关系导致载道主体的复合性, 而这种复合性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那里也有类似的体现。这些契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能够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文以载道; 马克思主义文论; 工具论; 主体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3.01.017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中国广泛传播, 成为引领当时中国社会的文艺思想。文坛选择马克思主义, 除了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有内在契合之处, 作为古代文论重要传统的“文以载道”, 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般认为, 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是北宋的周敦颐, 他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 艺也; 道德, 实也。笃其实, 而艺者书之, 美则爱, 爱则传焉。”^① 现代论者往往以此推断, 将“道”认定为儒家的孔孟之道, 将“文”认定为传达孔孟之道的文辞, 并从进化论的文艺观出发, 对此加以抨击。新文学运动提倡者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唐宋以来的“文以载道”, 但正如有学者所言, 中国所旧有的“文以载道”, 以“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的形式而复活着^②。这种“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 指的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左翼文艺复活“文以载道”, 其根本原因在于文以载道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根本上并不冲突。马克思主义文论提出, “古人说, 文以载道, 我们也说文以载道。我们相信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我们的道”^③, 更是直接将文以载道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

作者简介: 江守义, 男,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项目编号: 18ZDA275)。

①《周敦颐集》, 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第 34 页。

②《朱光潜全集》第 3 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32 页。

③《周扬文集》第 5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34 页。

其实,早在周敦颐之前,传统文学曾不乏“文以载道”的相关论述。最初的说法是“文以明道”。这一思想在《荀子》中已有端倪。《荀子·解蔽》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①,道乃天地长存的规律。《荀子·儒效》言道是“君子之道”^②,认为君子是道的体现者。《荀子·乐论》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③乐在荀子那里,是从属于文的,换言之,荀子已经将文和道联系在一起,初现“文以明道”的端倪。六朝以后,“文以载道”的相关论述多起来了。刘勰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④,韩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⑤,李汉在总结韩愈的相关思想时说“文者,贯道之器也。”^⑥从这些论述来看,现代论者将文、道截然两分似有不准。韩非子云“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⑦意即道与文通过“理”而成为一体,理既依据于道,又表现为文,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表现。就此而言,文与道是相互依存的。刘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⑧一句,更将“道”和“文”紧紧联系在一起,指出道通过文而流传,圣人通过文而明道,文、道无法分开。没有了文,圣人就无法“明道”。韩愈同样强调道和文的联系,文既然是贯道之器,文中即有道,离开了文,就无所谓道了。要言之,道成文,文即道。

从文与道相互依存看,“文以载道”之“道”,还具有今人所说的真理的意思。钱穆说“中国传统之人文主义,乃主由每一个人之真修实践中而表达出人生之全部最高真理。故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⑨郜元宝说得更直接“古人讲‘文以载道’,虽然有伪道学的酸臭气,但初衷绝非作伪。……再说‘道’就不讲‘思想’‘情感’吗?说到底‘言志’‘缘情’不都根基于‘道’吗?不仅文学上的‘情’与‘志’与‘道’密不可分,哲学上普遍所讲的情、性、志、思,也无不渊源于‘道’——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反对单纯的人道主义,更是偏重于‘道’(存在),将思想感情之类降为第二位概念,而由‘道’来统辖;其艺术论的第一位概念,也由思想感情之类返之于‘道’(存在与真理)。思想情感不能离道而独立,其理甚明。”^⑩这就将“文以载道”之“道”和真理直接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文论更是关注文学的真理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⑪文学是艺术精神掌握世界的一种实践方式,“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⑫。文学实践证明,人的思维能产生诸如改造社会等现实后果的威力,思维能改造社会,思维的此岸性是说人的思维在实践中的可理解性,这是思维真理性的前提。如果说“道”类似于“客观的真理”,“文中有道”则不仅说文体现了道,也意味着文即道,这与文学实践本身体现出真理几乎如出一辙。

对真理的向往成为传统“文以载道”观的拥护者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共同意愿。对传统文人

①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1页。

②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2页。

③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1页。

④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⑤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⑥董诰等《全唐文》第744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97页。

⑦《韩非子》,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8页。

⑧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⑨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0页。

⑩郜元宝《“文化失语症”的语言学诠释》,《大家》1997年第1期。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而言,学习圣人之言是为人文的必要途径,“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①。可以说,对圣人之道追求是传统士人的终极理想。圣人之道,落到实处,一是主体内心达到一种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它超越了道德境界中的“穷人之理,尽人之性”,达到了“穷世界之理,尽世界之性”的高度^②。简言之,即超越了以人性的自觉来行人道的高度,达到了以天理的自觉来行天道的高度。二是人们所生活的社会达到一种和谐境界。古代文人,由于特殊的士阶层的社会地位,他们往往一方面向上,通过出仕为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方面则向下,通过著书立说,教化民众,二者都指向文人心中理想蓝图——太平盛世。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千古名句即是传统文人的共同心声,很多文人心中往往大都是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吴芳吉从阐释孔孟入手,强调了道的重要性:“孔孟所为道者,曰忠恕之道,曰仁义之道,曰孝弟之道,曰中庸之道;曰富贵不以其道不处、贫贱不以其道不去之道。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之道;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之道;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之道;曰喜怒哀乐发而中节之道。凡此种种,皆文以载道之所为道也。概括言之,生人共由之路,皆谓之道。文以载道者,谓为文者必由此生人之路以行之也。”^③

虽然古人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和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能完全等同,但在社会平等、和谐等方面的要求却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共产主义社会是远大理想,需要经过漫长的革命征途才能达到,但他们相信,革命之后一定会有所收获。“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④。马克思主义要求解放无产阶级,但同时明确表示,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⑤。解放全人类,既是解放无产阶级自身的途径,也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理想追求。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被很自然地同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结合起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接受、理解与阐释时,消化吸收了传统观念的合理因素”^⑥,文以载道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在反传统的影响下,一些人对文以载道持批判态度,但到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却认为“文学革命的真意义”与文以载道有相通之处。他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古人说‘文以载道’,在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也不错的。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纲常伦教,所以那时的文所载的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⑦郭沫若将“道”理解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将道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为文以载道和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一个通道。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体现了特定时代的真理和理想。由于不同时代的真理和理想有所差异,以前的“文”用来载圣贤之道,现在的“文”则成了载革命之道。如果文学坚持革命的理想情怀,文学就不失载道之功。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们更关注文学“现实”的一面,到“左

①《柳宗元文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95页。

②冯友兰《新原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0页。

③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录湘君季刊)》,《学衡》第21期,1923年9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⑥泓峻《传统观念介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具体方式》,《求索》2022年第5期。

⑦冯乃超等《文艺讲座》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74—75页。

联’《理论纲领》宣布“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①的时候,道已经由理想转变成实际的政治和革命,转变为实际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文学也成为政治和革命的“武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以载道的理想强调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左翼文艺反对封建之道,但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解放全人类,可以让人类过上幸福的生活,则又回到了文以载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

二

文以载道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文不是为文本身,而是为了载道,这种强烈的现实性特征将文学与纯文本之外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体现出文学的实用性,另一方面为文学功用性打下基础,文学有可能成为载道的载体。就文学的实用性而言,文以载道有其教化功用,这与儒家治国强调修身有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②。在传统儒家看来,治理国家不能只靠严刑峻法,还与自身的品德修养密切相关。对士人而言,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对普通人来说,修身才能“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才能够在处理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时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③。对修身的重视,让儒家的德治有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对教化百姓和治理国家而言,德治是有效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将“道之以德”作为淳化民风的基础。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文所载之“道”弘扬的是儒家的大道,而儒家的大道又以修身为根基,文所载之“道”与儒家的修身之道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所载之“道”固然是通过文才得以体现,但这个“道”又远远溢出文的范围而与现实社会中的修身之道联系在一起。就文以载道自身来说,文之所以要载道,与现实社会中人的修身需要不无关系,这就突出地体现了文以载道的实用性:文以载道不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的说理,而是作用于社会层面的伦理效用。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论,其重心同样是指向文本外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评价文学有两个标准: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这既照顾到文学的艺术水准,又照顾到文学的思想倾向,思想和艺术兼顾,比较通达。恩格斯在谈到歌德时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⑤,这就将歌德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量。“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⑥歌德的矛盾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⑦。显然,这两个方面的合力,让恩格斯从历史的观点来评价歌德,与中国古代“知人论世”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主要还是“历史的观点”。在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个带有很强政策性的文艺评论中,强调文艺的历史属性、思想属性和政治属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中,非常重视文学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倾向。这和文以载道对“道”的关注及其教化功能有类似之处。

①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第10页。

②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01页。

③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1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4页。

从文以载道本身来说,其关注文与道结合中对现实的功用性。文所载之“道”具有超越性,它不纠缠于某一具象的东西。“‘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以自己的方式来阐发与呈现道的真义,由于道的真义是恒久的,自足的,本原性的,这种阐发不是服务的,而是启示的,不是追随的,而是自主的,不是重复的,而是创造的”^①。以此言之,文所载之“道”不直接作用于现实的政治人生,是为了树立人们心中的理想,和工具论所要求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看似没有直接联系。但文以载道的功用性,是因为文以载道必须要将文以载道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文以载道由此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性。中唐时期,韩愈提倡文以载道,目标是通过宣扬儒学来反对佞佛,政治目的非常明确。欧阳修作为政治家,关注民生让他很自然地强调“道”的现实指向性,在他看来,“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②,道就蕴含在日常的“养生送死”之中。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信仰,为了这种信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

从信仰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它超越了具体的细枝末节,与“道”一样成为一种理想,这让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文论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其一,从宏观层面上对文论状况进行分析,以见出文学发展趋势。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谓代表。其二,从微观层面上对某个具体作家作品展开分析,最终指向的却是具体作家作品所揭示出来的道理。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和《济金根》的批评可谓代表。在分析巴尔扎克时,恩格斯指出,“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种在作品中揭示现实真相的做法,被恩格斯看成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④。在批评拉萨尔的《济金根》中,恩格斯得出的是一个普泛性的结论:历史悲剧揭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⑤。

三

文以载道需要通过具体的主体来完成,主体在其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历来说法不一。在宋代理学家那里,文以载道的重心在“道”,不论何人用文来载道,道都是不变的。首次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传矣。”^⑥从周敦颐的话来看,道就是道德,只要有德者将其道德表达出来,就是“有言”,换个角度看,只要能在文中突出道德的重要性,文辞由谁来表达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在理学家那里,只要有“道”的指引,文以载道的主体可以忽略。但在很多文学家那里,载道离不开主体的“言志”诉求,载道可以转换成主体意识较浓的“言志”。在王禹偁看来,没有社会地位的文人很难实现载道的抱负,只能转换成容易实现的言志“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⑦“志”中隐含着“道”。之所以通过言志来载道,

①刘锋杰《“文以载道”再评价——作为一个“文论原型”的结构分析》,《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②《欧阳修全集》第5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7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页。

⑥《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页。

⑦《王禹偁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是由于文人心中有对道的坚守。韩愈的“不平则鸣”虽然主要是说主体因抑郁不得志而发声,但主体之“鸣”中也含有对“道”的追求“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①，“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②不平则鸣可认为是“言志”说的一种具体情形,言志让载道打上了鲜明的主体烙印。总之,文以载道强调主体作用,其实是将言志和载道联系起来,将个人的情怀和载道的志向联系起来,在穷达之时或偏向言志、或偏向载道,达则以载道来兼济天下,穷则用言志来独善其身。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真理和信仰,当然有其理想指引意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主体意识如何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者,如何处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许是巧合,与文以载道对主体的认识一样,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对主体意识也有复合性:一种认为主体要服从于客观规律和要求,重视不同主体之间思想的一致性;另一种则主张主体在阐发马克思主义文论原理的时候,要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一种看法以列宁所强调的文艺的反映论为代表。列宁认为“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③，“客观实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④。在列宁反映论的指导下,毕达可夫完成了《文艺学引论》,认为“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中如何反映现实的科学”^⑤,从“文艺反映现实”出发,经过一个“观念圈”的循环,回到文艺如何反映现实的起点,循环的具体路径如下:“文艺反映现实”→“现实是有规律的”→此规律已被“经典作家和苏联共产党的优秀活动家”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所阐明→这是“最高的、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好的文学就是形象地传播此“思想”的特殊形式^⑥。在这一观点看来,文学形象地传播思想是文学反映现实的一种样式,文学传播什么样的思想,文学反映什么样的现实,都已经被阐明“艺术永远为一定阶级服务,它过去和现在都是阶级斗争中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⑦既然文艺永远是为阶级服务的,作家的主体作用也必然要服务于阶级意识。第二种看法则着眼于个体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战斗要求和人格力量。

其实从根本上而言,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对文艺主体的认识上,二者其实是有机统一的。朱熹认同周敦颐“文以载道”的思想,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⑧。只不过,道在他那里,有时成为“义理”的代名词。“古之圣贤所以教人,不过使之讲明天下之义理,以开发其心之知识,然后力行固守以终其身。而凡其见之言论、措之事业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别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华靡、事业之恢宏也。”^⑨义理乃天下公理,自然是外在于主体的。然而,朱熹并没有将去主体的“义理”和取“主体”的言志截然对立起来,而是通过“自发”沟通义理和言志“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

①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②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③《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④《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页。

⑤[苏]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⑥夏中义:《反映论与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中国文论学科的方法论源流考辨》,《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

⑦[苏]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⑧《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页。

⑨《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4页。

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①与此同时,在论述“诗言志”传统时,朱熹也将德和志联系起来“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②这样看来,即使在强调载道的理学家那里,也留下了载道通往言志的通道,主体也由此在文以载道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强调作家的创作首先要理解政策“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从反映各个人物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他们的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斗争、各个阶级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各个阶级的命运。”^③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文艺要做好服务,也要重视作家主体意识,“作品的思想应该由作家从观察和研究生活中得来,……如果从概念出发,……这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④。

文以载道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主体问题上的契合反映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信仰与个人的主体意识要有机统一。

20世纪早期,诸多西方文论涌入中国,不久,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根基的左翼文论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延安时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论界的指导地位。中国文论界重视文学社会功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这和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有内在关系。就文学追求看,二者都认为文学有其理想性,主张文学可通往真理;就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看,二者都关注文学的社会功用,强调文学的实用性;就文学主体看,文以载道的主体在“言志”和“载道”之间互动,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主体的认识,也在重视不同主体思想的一致性与发挥个性化主体的能动性之间互动。对文学真理和理想的认可、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关注、对文学主体的认识,都表明文以载道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有内在契合性。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内在契合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获得理论生长点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马延炜)

①《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页。

②《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8页。

③《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1页。

④《周扬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